

《茶之书》茶叶西传欧洲的记述考释*

刘章才

【摘 要】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影响甚广，但其中涉及茶叶西传欧洲的内容多有疏漏：在欧洲关于茶叶最早的记述、《马可·波罗游记》是否提及茶叶、茶叶进入英国的时间以及传教士阿尔梅达涉茶书信的书写年代等问题上，或材料使用不当，或认识存在偏差；关于茶叶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论断失之偏颇；对茶叶在欧洲遭遇抵制的分析亦尚可深入。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源于作者的知识结构限制以及在日俄战争后竭力为日本辩护的意图。不过，该书在选题与写作方式上契合当时美国民众的兴趣，受到了广泛欢迎，后来又随着我国茶文化的升温而大量出版中文译本。对《茶之书》进行考释，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其内容，而且对茶史研究须注意内史与外史的结合不无提示意义。

【关键词】冈仓天心 《茶之书》 欧洲 茶叶传播 日俄战争

【作者简介】刘章才，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K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5）05-0073-19

冈仓天心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美术家、美术批评与教育家”，^① 堪称日本近代文明启蒙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 20 世纪初旅美期间，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殖民主义视域下的英国对华茶业考察研究（1787—1905）”（21BSS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日] 冈仓天心：《中国的美术及其他》，蔡春华译，中华书局 2009 年版，“前言”，第 1 页。

冈仓天心以时而激昂、时而优美的语言先后完成了《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茶之书》等英文著作，其中1906年出版的《茶之书》流传最广。^①在《茶之书》中，冈仓天心主要基于禅宗思想构建了自己的茶学说。该书出版后在美国社会受到极大欢迎，后来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全球广泛传播。^②近年来，《茶之书》在我国成为现象级出版物，仅自2017年至今就有十余种不同译者的译本问世。^③各界人士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旅日学者李长声认为，《茶之书》既是使日本文化走向世界的书，也是能让日本人乃至东方人认识自己文化的书；^④著名作家、茶文化学者王旭烽表示，“有人称其（引按：《茶之书》）为日本文化不朽之篇，不是没有道理的”；^⑤文学研究者蔡春华力陈“《茶之书》向西方读者呈现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艺术世界，从茶的出现、日常的饮茶到茶道”，^⑥还将《茶之书》誉为“一曲意味深远的以‘茶道’为主题的‘高山流水’”。^⑦

《茶之书》作为经典名著广受好评，其价值已然得到充分肯定，但该书毕竟撰写、出版于100多年前，其中部分内容实则多有疏漏，目前中外学界对此尚缺乏关注。故此，笔者不揣浅陋，对《茶之书》中关于茶叶在欧洲传播的记述予以考释，以期增进学界对该书的理解乃至深化对茶叶西传欧洲早期历史的认识，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
- ① 笔者在撰文过程中同时参考了中文译本与英文原版，参见[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Okakura Kakuzo, *The Book of Tea*, New York: Duffield & Company, 1906。
- ② 关于《茶之书》在全球的传播与出版状况，参见许欢、崔訥、张影等：《〈茶之书〉百年出版传播研究》，《出版科学》2019年第1期，第113~120页。
- ③ 目前，《茶之书》已有数十种中文译本，据笔者目力所及，该书近年的翻译出版状况为：2017年有高伟、王思颖、王蓓的三种译本出版，2018年有柴建华、胡越的两种译本出版，2019年有吕灵芝的译本出版，2020年有闻春国、张唤民的两种译本出版，2022年有张语铄、尤海燕的两种译本出版，2024年有陈笑薇的译本出版。其中有些译本多次出版，不再列举。
- ④ 参见[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序二”，第19页。
- ⑤ 王旭烽：《站在东方茶席旁的天心》，《茶博览》2021年第7期，第76页。
- ⑥ 蔡春华：《〈茶之书〉：面向西方世界的言说》，麦永雄主编：《东方丛刊》2008年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 ⑦ [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导言”，第6页。

一、欧洲早期茶叶传播史之考辨

《茶之书》面向西方读者阐述日本茶道，自然离不开对茶文化相关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其中对茶叶在欧洲早期传播的历史书写存有明显疏漏，以下试析之。

冈仓天心认为，欧洲关于茶叶最早的记述源自一位阿拉伯旅人的言谈，“在他的话中曾经提到，公元 879 年时，中国广东一省的主要税收，乃是盐茶之税”。^① 由于《茶之书》的注释极少，故此说不知何据。就笔者眼界所及，与之最为相似的记述见于《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具体内容为：“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②《中国印度见闻录》由发现于叙利亚阿勒颇的一份古代手稿编译而成，该手稿后来流入法国，^③ 法兰西学院院长阿贝·厄塞布·雷诺多（Abbé Eusèbe Renaudot）对其中的前两部分进行了翻译整理，于 1718 年以《九世纪两位回教旅行家印度及中国游记》为名出版。据研究，手稿中涉及茶叶的内容撰写于回历 237 年，大约为公元 851 年，^④ 与冈仓天心所言的 879 年相差甚远。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手稿是否在撰写后很快传入欧洲，使欧洲人获得关于茶叶的资讯，同样不得而知。换言之，手稿本身的撰写年代与欧洲人获得茶叶相关资讯的年代不可等同。目前可以确知的是，欧洲人对茶叶最早的记述出现在 1556—1557 年，当时多明我会传教士团东来，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随团传教，曾在中国沿海的广州等地居住了几个月，得以亲身观察甚至体验当地的社会生活。克路士在行记中提到，

① [日] 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 页。

②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7 页。

③ 该文献现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系阿拉伯文藏书目录第 2281 号，参见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法译本序言”，第 5 页。

④ 参见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法译本序言”，第 6~9 页。

中国人饮用“一种他们称为茶(chā)的热水”，并将茶叶描述为“一种略带苦味的草”。^①不过，克路士的行记整理刊印颇费时日，至1570年才在葡萄牙的埃武拉(Évora)问世，^②这一延误使威尼斯学者兼官员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后来居上。赖麦锡凭借威尼斯作为商业枢纽的优势，与各色人等交游甚广，他从曾经到访印度的商人哈兹·穆罕默德(Hazzi Mohamed)处得知“茶叶”这一异域产物，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与记录，^③其著作《航海旅行记》第2卷于1559年出版，使茶叶这一东方饮品开始进入更多欧洲人的视野。克路士接触并记述茶叶无疑更早，但其著作问世较晚，因此欧洲人最早是通过赖麦锡的著作了解到茶叶的。1935年，美国学者威廉·H. 尤克斯(William H. Ukers)在其巨著《茶叶全书》中即指出：“欧洲文献首先提及茶叶是在1559年，它以‘Chai Catai’(Tea of China)之名出现在赖麦锡所著《航海旅行记》中。”^④英国学者马克曼·埃利斯(Markman Ellis)等在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同样认为欧洲关于茶叶的信息“最早的明确记载出现在《航海旅行记》第2卷中，作者是颇具权势的威尼斯商人兼学者赖麦锡”。^⑤可以看出，冈仓天心所谓欧洲关于茶叶的最早记述源自阿拉伯旅人言谈的观点缺乏依据、难以成立。

除此之外，冈仓天心在叙述欧洲人对茶叶的了解时还提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1285年时，曾有一位中国的财政官员，因为擅自提高茶税征赋而被免职。”^⑥《马可·波罗游记》虽极为常见，但该书在流传过程中屡经增删，现存版本众多，^⑦致使辨析冈仓天心的这一说法颇具难度，幸而中

① 参见[英]C. R. 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8页。

② 参见[英]C. R. 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导言”，第35~36页。

③ 参见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 Vol. 2, Venezia: Giunti, 1559, carta 15v。

④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Vol.1,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p.23.

⑤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London: Reaction Books, 2015, p.19.

⑥ [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⑦ 截至20世纪30年代，《马可·波罗游记》已有143种抄写稿本与印刷本，英国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后来又发现7种分散的版本。参见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11页。

外学界的已有研究为此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参考。英国汉学家吴芳思长期任职于大英图书馆，曾对《马可·波罗游记》进行过系统收集与研究，但未发现任何版本提及茶叶，这成为她论证马可·波罗本人未曾到过中国的重要依据：“或许更不可思议的是，马可·波罗对杭州市场上出现的食品，以及皇家宴席上出现的饮料和酒类，都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却只字不提茶叶。”^① 中国学界对此亦有深入探讨。元史专家杨志玖认为，马可·波罗之所以没有提到茶叶，“可能是因他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当时蒙古人和其他西域人也不大喝茶，马可波罗多半和这些人来往，很少接触汉人，因而不提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同样，他不识汉字，因而未提汉字的书法和印刷术”。^② 另一位元史专家黄时鉴认为，“马可波罗未有记茶，这成了某些学者判断他未曾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之一。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③ 并在对13世纪蒙古人和回回人的饮茶状况加以分析后指出，“我们也很难说在13世纪90年代以前蒙古人和回回人已经饮茶成风。在上述情况下，马可波罗来华（1275—1291居留中国），倘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间，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信息”。^④ 以上中国学界的论述均认为马可·波罗曾经到过中国。不过，中外学界在《马可·波罗游记》没有提及茶叶这一点上认识一致，中国学界对此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冈仓天心的说法明显有误。

关于茶叶进入英国的时间，冈仓天心如此记述道：“1650年，英国终于迎来了这款‘受到所有医生认可，来自中国的绝佳风味，中国人自己称它为茶，其他国家叫它Tay，也就是tee’的饮料。”^⑤ 茶叶于何时进入英国是一个学界聚讼已久的问题。尤克斯认为，“茶叶最早输入英国的时间没有记录……大致

① [英] 吴芳思：《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张学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

② 杨志玖：《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③ 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41页。

④ 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44页。

⑤ [日] 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需要指出的是，中文译本将原文中的“tee”写作“tea”，鉴于“tee”为“tea”的早期写法，笔者在此保持了原文。

在17世纪中叶某个时间”，^① 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则认为，饮茶习俗在1635年就已出现在伦敦、阿姆斯特丹与巴黎等地。^② 不独海外学界，中国学者对此同样意见不一。邹瑚、陈椽与刘礼堂等均在研究中提到，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637年开始从广州运走茶叶，^③ 按照当时的贸易周期推算，茶叶在当年或次年就可运抵英国。张应龙、仲伟民持不同观点，认为茶叶迟至1645年才进入英国本土。^④ 刘勇则采用了较为模糊的说法，“17世纪50年代，茶叶开始在英国引起时人的关注”。^⑤ 学界在该问题上直至今日未能达成共识，原因在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冈仓天心的“1650年说”虽可视为一种个人观点，其援引的材料却无法提供支持，该材料的原文为：“That excellent and by all physicians approved China drink, called by the Chineans Tcha, and by other nations Tay, alias Tee.”^⑥ 此语实际上出自咖啡馆“苏丹王妃之首”（Sultanness-Head）的广告词，该咖啡馆在引入茶叶后试图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因此在《政治公报》（*Mercurius Politicus*）上广而告之，广告词全文为：“That excellent, and by all physicians approved, China drink, called by the Chineans, Tcha, by other nations Tay alias Tee, is sold at the Sultanness-head, a Cophee-house in Sweetings Rents by the Royal Exchange, London.”^⑦ 可译为：“质量优异、已得到医师认可的一种中国饮品——中国人称为茶（Tcha）而其他国家则称为 Tay 或 Tee，在位于斯威廷思巷的‘苏丹王妃之首’咖啡馆有售，位置毗邻伦敦皇家交易所。”该广告于1658年9月23日至30日刊登在《政治快报》上，并非冈仓天心认为的

①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Vol.1,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p.38.

② 参见 Anthony Burgess, *The Book of Tea*, Paris: Flammarion, 1990, p.58.

③ 参见邹瑚：《英国早期的饮茶史料——英国人饮茶始于何时？》，《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第243页；陈椽：《中国茶叶外销史》，台湾碧山岩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7页；刘礼堂、陈韬：《清代茶叶贸易视野下的中英关系——以贸易博弈为中心的考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人文论丛》2020年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3页。

④ 参见张应龙：《中国茶叶外销史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4年，第33页；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3页。

⑤ 刘勇：《中国茶叶与近代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8页。

⑥ Okakura Kakuzo, *The Book of Tea*, New York: Duffield & Company, 1906, p.15.

⑦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Vol.1,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p.42.

1650年，这导致其观点根本无从谈起。

在介绍欧洲人对茶叶的早期认知时，冈仓天心根据保罗·克兰塞尔（Paul Kransel）的文章述及“阿尔梅达于1576年……也提到种种茶的点滴”。^①这里的“阿尔梅达”的身份颇为清楚，此人全名为路易斯·德·阿尔梅达（Luis de Almeida），约1525年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长大后学习医学并于1546年取得医师资格证，最初基于贸易目的来到日本，后来投身传教事业，成为一名医疗传教士，曾在丰后府内开设由内科、外科、麻风病科与小儿科构成的综合性医院，“名声远播京畿、关东等地，求医者激增”。^②作为医师，阿尔梅达对各类药物颇感兴趣，由此注意到日本人的饮茶习惯，他将茶叶视为药草，并在向国内写信时特意加以介绍：“一种被碾成粉末的药草，称为茶（cha），对任何惯于饮用的人来说令人愉悦。”^③不过，此信的书写时间并非1576年，而是“1565年10月”，^④冈仓天心所述明显有误。

纵观《茶之书》对茶叶在欧洲早期传播的记述，在欧洲关于茶叶最早的记述、《马可·波罗游记》是否提及茶叶、茶叶进入英国的时间以及传教士阿尔梅达涉茶书信的书写年代等问题上，均存有明显疏漏。

二、茶叶对美国独立影响之辨析

冈仓天心叙述茶叶在欧洲的传播历史，自然涉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北美销售茶叶的问题，特别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茶叶的抵制，他认为：“提到这件事，便可联想到茶是如何左右现代史的发展：美洲殖民地之所以忍无可忍，

① [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② 王秋菊：《日本德川时代西方科技传播研究》，东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6页。

③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London: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52.

④ 关于阿尔梅达这封信的书写时间，C.R.博克瑟记录的是1565年10月，迈克尔·库珀的记录更为具体，为1565年10月25日，参见C.R.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London: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52; Michael Cooper, *The Early Europeans and Tea*, in Paul Varley and Kumakura Isao, eds., *Tea in Japan: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Chanoy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131, n.10.

决定向英国揭竿起义，正是由于后者对茶课以重税所致。民众将茶叶货柜推落波士顿湾底以示抗议，更被视为美国独立的开端。”^① 这些论述多有偏颇之处。

冈仓天心此处提及的正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其大致情况今人较为熟悉。1756—1763年，为争夺殖民地与掌控欧洲霸权，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爆发了“七年战争”。英国虽最终取胜，但战事的消耗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因此力图强化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以转嫁军费负担。英国议会先后通过《印花税法》（1765年）与《唐森德税法》（1767年），但遭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最终被迫取消，只有被英国人视为宗主国主权象征的茶税保留了下来。然而，北美殖民地人民并未停止抗争，“宁愿向其他国家购茶，也不愿牺牲原则从英国购买”。^② 1773年12月16日夜，激进人士将停泊在波士顿港口商船上的茶叶倒入大海，史称“波士顿倾茶事件”。此后，英国议会通过五项“强制法令”（Intolerable Acts），导致北美殖民地人民进一步联合反抗，并促使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随着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美国独立战争最终爆发。

不难看出，英国征收茶税的确直接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但冈仓天心所谓英国对茶叶“课以重税”导致北美殖民地人民“忍无可忍”，与历史实际似乎并不吻合。英国是否在北美殖民地对茶叶“课以重税”，其实比较一组数据即可知晓：英国议会通过的《唐森德税法》对在北美殖民地销售的茶叶每磅征税3便士，而在英国本土，1760—1767年“茶叶平均价格为每磅4先令8便士，税负为净价的90%”。^③ 可见，北美殖民地的茶税与英国本土相比可谓仅具象征性。尤克斯在《茶叶全书》中已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茶税问题，指出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所征茶税很低，致使北美市场上的英国茶

① [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茶叶货柜”的原文为“Tea-chests”，指的是装茶叶的木箱，当时中西茶叶贸易普遍采用将茶叶装入木箱进行运输的方式。参见刘章才：《十八世纪中英茶叶贸易中的运输问题》，《文化杂志》（中文版）2021年总第111期，第158~162页。

②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Vol.1, New York: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p.52.

③ William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 Vol. II, London: Black, Parry, & Co., 1813, p.538.

叶比荷兰茶叶价格更低。^①冈仓天心所述“重税”可能更多是其主观想象的结果。

既然英国“课以重税”这一说法并不成立，那么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所谓北美殖民地人民“忍无可忍”就更与事实相去甚远了。其实，恰恰是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统治过于宽松，才导致统治措施稍显严厉即遭到激烈抵抗，即并非过度的压迫激起反抗，而是统治过于宽松孕育了反抗。李剑鸣曾对北美独立运动兴起的原因做出深刻剖析：“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比较宽松，使北美获得了稳步而迅速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使之具备了谋取政治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所谓‘高压政策’并不是反英运动的导因，而是其不断升级的结果。因此，独立运动并不是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统治的被动反抗，而是他们主动寻求更大利益的行动。”^②这一观点已为学界广泛认可。

正是基于英国对茶叶“课以重税”导致北美殖民地人民“忍无可忍”这一观点，冈仓天心过分夸大了茶叶在历史变局中担当的角色，甚至认为茶叶可以“左右现代史的发展”。事实上，早在1835年即有人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起因加以重新审视，认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举动并非针对茶叶（乃至英国人此前纳入征税范围的商品）本身，“它所引发的整个相关问题，不在于征税商品的数量，也不在于征税的数额，而是征税的权利”。^③北美殖民地人民认为英国议会无权进行征税，此举损害了其自由和权利，这体现出“北美居民习惯于从自由和权利的角度来审视英国的政策，而很少从经济角度看问题”。^④美国学者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深刻指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这一取向深受英国政治思想影响，而“不列颠式的自由思想推崇法治，坚持一个人拥有在其所居住的社区认可的立法下生活的权利，主张对政治权威的专

① 参见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Vol.1, New York: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p.52。

② 李剑鸣：《英国的殖民地政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63页。

③ A Bostonian, *Traits of the Tea Party; Being a Memoir of George R. T. Hewes, One of the Last of Its Survivors, with a History of that Transac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5, p.135.

④ 李剑鸣：《英国的殖民地政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74页。

断行为进行限制，而且力主实施受普通法保护的类似陪审团制这样的权利”，在他看来，美国独立战争并非以达成具体经济目的为旨归，而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① 进而言之，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这一取向可视为欧洲文明影响的结果。侯建新先生将欧洲文明的内核（“元规则”）概括为五方面内容——“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生命权利”，^② 英国人的举措实则侵犯了这些被广为认同的基本准则。今日做出这种判断并非硬性拔高，前人对此已有所认识。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于1775年3月在下院发表《关于与美利坚和解的演说》，他极具洞察力地谈道：

由于这六大原因——血统、政府形式、北部殖民地的宗教、南部殖民地的风俗、教育以及远离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得北美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与殖民地人民的发展同步，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而不断加强。这种精神——它不幸与一项英国行使的权力迎头相撞，这项权力尽管合法，却与任何自由的观念，尤其是他们的观念不调和——已经燃起的火焰，随时可能将我们化为灰烬。^③

由是观之，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主要动因是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英国人在北美殖民地已然成为自身尊奉原则的违反者，由此激起北美殖民地人民进行“武器的批判”。茶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作用与影响不应被夸大，远未达到冈仓天心所说的“左右现代史的发展”的程度。

三、茶叶在欧洲遭遇抵制之阐述

《茶之书》还述及茶叶在欧洲传播过程中遭遇的阻碍：

如同世上所有的美好事物一般，茶在传播过程中也曾遇过阻碍。1678年，亨利·萨维曾主张喝茶是种肮脏的习俗。强纳斯·汉威在1756年那篇《论茶》中写道：养成喝茶的习惯后，男人们失去了仪

①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6、36页。

② 参见侯建新：《西方文明再诠释》，《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4期，第19页。

③ [英]伯克著，陈志瑞、石斌编：《埃德蒙·伯克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表，女人们失去了美貌。其花费不貲（一磅约十五或十六先令），让平民百姓自始就无福消受，因而“茶是标榜上流社会的娱乐享受，并且成为王公贵族的社交赠礼”。^①

冈仓天心对茶叶作为饮品何以引发抵制这一重要问题未做展开，令人费解，实则尚可进一步深入。他此处提到两个人物：“强纳斯·汉威”（Jonas Hanway）系著名的慈善家与旅行家，在后世作为反对饮茶者与英国首位使用雨伞者而为人所知；至于“亨利·萨维”（Henry Saville），人们知之甚少，目前有关此人谈论饮茶的资料主要见于《钱伯斯日常之书：关于历法的大众古俗杂录》（*Chambers's Book of Days, A Miscellany of Popular Antiqu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lendar*）和《巴拉瑞特星报》（*The Ballarat Star*）。前者收录的《茶之引入》一文提及亨利·萨维曾在1678年写信给自己的叔叔，贬斥一些朋友在晚餐后呼要茶水而不是烟斗或酒水，将这种行为称作卑劣的“印度做法”，该文作者认为亨利·萨维似乎赞同普尔·罗宾（Poor Robin）的观点——相对一碟乳清而言，阿拉伯茶水不过是泔水。^②后者于1894年1月6日刊登的《饮茶习惯》一文述及“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提供的信息，称英国人是饮茶民族，人均每年约消费5.5磅茶叶，泡制成茶水后约为37加仑，这导致英国人的神经与胃脏在一定程度上受损。该文进而提到早在1678年，有一位道德家亨利·萨维即谴责饮茶为“肮脏的习俗”，他在信件中不无愤慨地批评很多人在用餐后要茶水——一种卑劣、不值一提的“印度做法”——而不是烟斗或酒水，声称自己永远钦佩那些没有如此做的信奉基督教的家庭。该文作者认为19世纪末的情况显然更为严重，人们的茶叶消费比父母一代更多，饮茶也更为频繁，并预测将来可能有一天，新的禁“酒”主义者会含着眼泪劝告人们：放弃可恶的茶叶，改为喝可可甚至啤酒吧！^③冈仓天心的文字表述与《饮茶习惯》一文更为接近，但无论他参考的是上述哪一种材料，此处都涉及茶叶西传欧洲过程中遭遇的重要波折，有必要稍加展开。

作为一种新奇的东方舶来品，茶叶在进入欧洲之初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

① [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② 参见 Robert Chambers, *Chambers's Book of Days, A Miscellany of Popular Antiqu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lendar*, Vol. II,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73, p.667。

③ 参见 The Habit of Tea-Drinking, *The Ballarat Star*, January 6, 1894。

评与欢迎，既作为药物使用，亦作为饮品饮用。然而，随着茶叶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影响的日益深化，这一外来饮品开始遭遇文化碰撞，欧洲部分社会人士对其展开批评乃至坚决抵制。1635年，德国医师西蒙·保利（Simon Pauli）炮制“茶叶有害论”，认为茶叶尽管具有一定益处，但是其负面作用更为显著，容易导致饮用者寿命缩短，此种现象在40岁以上人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①在饮茶风气更盛的荷兰，人们亦就饮茶之利弊展开争论。支持饮茶者强调茶叶对人体健康有良好功效，著名的“茶叶医生”科内利斯·庞德古（Cornelis Bontekoe）尤为引人注目，他毫无避讳地大力宣扬饮茶有益的观点，认为“人体的每一部位几乎都受到茶叶的积极影响：饮茶不会导致身体极度消瘦，不会引起战栗或跌倒，不会对男女生育能力造成不良影响，对脑、眼、耳、口、喉、肠胃、胸腹、肺肾、血管、膀胱等部位都有良效”。^②反对饮茶者则针锋相对，他们认为饮茶有害，并借各种时机贬低茶叶，甚至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庞德古，认为他可能从荷兰东印度公司那里获得了特殊利益，从而成为其喉舌，对茶叶大加鼓吹。1685年，庞德古从楼梯上坠落而亡，刻薄的批评者非但丝毫不予同情，还将庞德古的意外死亡归咎于饮茶，讽刺他“凭自己的喜好滥用茶叶。频繁饮茶让他的体液枯竭，以至于在迎风走向别人的时候浑身关节就像响板一样咯吱咯吱地响”。^③他们对茶叶乃至庞德古本人的极度反感，由此可见一斑。

英国人接触茶叶稍晚，但随着饮茶风尚的日益畅行，加之受到欧陆抵制茶叶思潮的影响，18世纪英国社会各界关于饮茶亦出现分歧。饮茶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主要围绕两点进行交锋：其一，茶叶是否具备良好的功效；其二，饮茶是否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评价茶叶的功效或者说对身体的影响，需要运用较多医药与生理知识，故参与讨论者多具有医学背景。对茶叶功效持肯定态度者认为，饮茶具有多重益于身心的功效，如提神醒脑、预防痛风、有助消化、提振食欲、治疗肺病、防治体虚、延缓衰老。^④持否定乃至批判

① 参见 Tom Standag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ix Glasses*,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7, p.186。

② 刘勇：《中国茶叶与近代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1页。

③ 刘勇：《中国茶叶与近代荷兰饮茶习俗》，《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66页。

④ 参见 J.Ovington, *An Essay upon the Nature and Qualities of Tea*, London: Printed by and for R.Roberts, 1699; Anonymous, *The Volatile Spirit of Bohee-tea*, London: Publisher Unknown, 1710。

态度者则认为，饮茶会导致手部颤症、浑身战栗、胃气痛、败血症、疑病性失调、精神忧虑症。^① 为了解决这一争议，约翰·科克利·莱特瑟姆（John Coakley Lettsom）博士进行了一系列严谨的科学试验，最终得出结论：合理饮用茶叶能够产生多种良好功效，“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已经知道的植物所泡的水”。^② 至于饮茶是否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构成影响，社会改革家们各陈己见，冈仓天心提及的汉威便是其中一位，他确信饮茶会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持类似观点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神学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他除了认为饮茶对身体健康毫无益处，还强调饮茶会造成道德败落，导致英国的财富不断外流，自身力量受到削弱，由此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问题。^③ 支持饮茶者如辞典编撰者约翰·麦克马思（John Mackmath）与著名的社会改革家 D. 戴维斯（D. Davies）等，对饮茶的影响则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一方面，茶叶已经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并非徒费钱财的高端奢侈品，饮茶有助于普通人更好地维持基本生活；另一方面，英国人向来重视商贸，茶叶贸易还可以推进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开拓。^④

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各阶层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整个社会已经初步进入消费革命阶段，饮茶恰好适应了人们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可以获得可观的商业利润，国家财政也可以借此增加税收。因此，上述争论未能真正阻挡饮茶之风在英国的传播。

① 参见 Anonymou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Use, and Abuse of Tea, in a Letter to a Lady; with an Account of Its Mechanical Operation*, London: Printed by J. Bettenham for James Lacy, 1722; F. N. Surgeon, *Remarks on Mr. Mason's Treatise upon Tea*, London: Printed for J. Roberts, 1745; John Wesley, *A Letter to a Friend, Concerning Tea*, London: Printed by Felix Farley, 1748。

② John Coakley Lettsom,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Tea-tree,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Medical Qualities of Tea, and Effects of Tea-drinking*, London: Printed for Edward and Charles Dilly, 1772, p.50.

③ 参见 John Wesley, *A Letter to a Friend, Concerning Tea*, London: Printed by Felix Farley, 1748; Jonas Hanway, *A Journal of Eight Days Journey from Portsmouth to Kingston upon Thames; through Southampton, Wiltshire, with Miscellaneous Thoughts, Moral and Religious; in Sixty-four Letters: Addressed to Two Ladies of the Partie. To Which is Added, an Essay on Tea*, London: Printed by H. Woodfall, 1756。

④ 参见 John Mackmath, *Considerations on the Duties upon Tea, and the Hardships Suffer'd by the Dealers in that Commodity*, London: Printed for M. Cooper, 1744; D. Davies, *The Case of Labourers in Husbandry*, London: Printed by R. Cruttwell, 1795。

此外，欧陆其他国家早于英国出现的饮茶争论亦逐渐消失。在这些国家，饮茶只是形成了一时的风潮，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相对有限，故人们的关注点很快发生转移，对茶叶的批评最终不了了之。

冈仓天心论及茶叶在欧洲受到的抵制，却未加以深究——这实质上是茶叶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遭遇的文化碰撞，具体表现为社会各界基于不同认知立场或利益诉求产生的争论。相关争论并未真正阻碍茶叶在欧洲的传播，主要原因在于茶叶消费符合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社会需求与国家利益，这也是支持饮茶者最终获胜的根由。

四、《茶之书》中疏漏产生之缘由

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对茶叶在欧洲传播的记述多有疏漏，不可视为一时疏忽。冈仓天心主要关注艺术领域，特别是与美术相关的研究，虽学习过茶道，但并未持续研修。同时，还须虑及冈仓天心撰写《茶之书》的特殊政治背景。

冈仓天心于1862年12月26日出生于横滨，^①自幼学习英语与汉语，长大后就读于东京大学，^②在主修西学的同时对艺术颇感兴趣，曾跟随南宗画家奥原晴湖学习，还拜茶人正阿弥为师修习过茶道，其大学毕业论文题为《艺术论》。^③自然而然，冈仓天心在毕业后主要从事与艺术尤其是与美术相关的工作：他不仅曾担任帝国博物馆美术部部长、东京美术学校校长等职，还曾前往印度开展古代文化遗迹考察；赴美之后，则主要任职于波士顿美术馆。可见，冈仓天心的学习经历与主要工作均与美术相关，尽管他在大学时

① 关于冈仓天心的出生日期，存在1862年12月26日与1863年2月14日两种说法，此处依据的是日本平凡社编《冈仓天心全集》中的观点，参见肖珊珊：《“间”结构下的困境：多重身份的冈仓天心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页。

② 冈仓天心先后就读于东京外国语学院初级班与东京开成学校，因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院于1877年合并为东京大学，故冈仓天心得以成为东京大学第一批学生。参见秋宏：《无问西东：冈仓天心与〈茶之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页。

③ 冈仓天心最初撰写的毕业论文题为《国家论》，但被妻子焚毁，他只好回归自己熟悉的艺术题材，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题为《艺术论》的毕业论文。参见秋宏：《无问西东：冈仓天心与〈茶之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4页。

曾修习茶道，但是既未继续深入学习，也未从事过专门研究。日本学者船曳建夫曾就此指出，冈仓天心其实“不是自己书（引按：《茶之书》）中所涉及对象的专家”，^①说明他对茶叶以及相关方面并无深入研究，这导致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对部分内容的论述不够准确，即知识结构的限制使该书出现疏漏。

此外，分析《茶之书》中疏漏产生的原因还须结合其写作背景。船曳建夫在论及《茶之书》等书籍时指出，“作者们的着眼点都在各自的话题之外”，^②揭示了冈仓天心撰写《茶之书》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事实上，冈仓天心意在基于日俄战争的特定背景向西方展示（实为塑造）日本良好的文化形象。

1904年2月，冈仓天心谋得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工作职位，并于同年3月抵达美国，而在此前的2月8日夜间，日俄战争已然爆发，日本海军突袭了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此后连战连胜，“直至1905年9月5日日俄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和约，日俄战争才告落幕”。^③在日俄战争进行期间，美国民众对日本颇为同情，美国政府出于维持地区均势从而便于谋取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日本或明或暗给予支持，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警惕。例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件中便明显表现出对日本的戒心，“如果日本人获胜，不仅斯拉夫人，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考虑东亚的一个巨大的新势力。胜利将使日本自动地成为东方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强国”，^④“日本人对我们很好。在他们由于对俄国的胜利而陶醉时，今后他们将怎么样，是只有未来才能决定的另一个问题”。^⑤日本在东方相继发动针对清朝的甲午战争

① [日] 船曳建夫：《新日本人论十二讲》，蔡敦达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② [日] 船曳建夫：《新日本人论十二讲》，蔡敦达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③ 董志正、田久川、关捷编著：《日俄战争始末》，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④ [美] 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给塞西尔·阿瑟·斯普林·赖斯的私人信（1904年3月19日于华盛顿）》，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42—1918）》，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

⑤ [美] 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给罗伯特·巴恩韦尔的信（1905年3月6日）》，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42—1918）》，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69页。

与针对俄国的日俄战争，其嗜血好战的一面不断凸显，这在西方日益引起关注与警惕。

冈仓天心身在美国，对国际局势与西方舆论有着清醒的观察，于是采取各种手段塑造日本爱好和平的形象。早在日俄战争期间，冈仓天心就出版了《日本的觉醒》一书，向西方介绍日本的近代历史变迁，从本土视角阐述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赫然为“日本与和平”（Japan and Peace），大言不惭地为日本的穷兵黩武辩护，“任何认真探究我们外交政策史的人可见，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保持持久和平的期许更清晰，我们被逼诉诸战争是出于保卫民族的需求。实际上，我们的文明本性禁止侵略他国”。^①不仅如此，冈仓天心还利用参加艺术活动的机会，为日本一再发动战争博取同情。例如，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冈仓天心进行了一场关于近代日本绘画的演讲，先是论及日本绘画虽具有重要审美价值，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之后竟将日本绘画需要生存与日本需要生存相等同，声称“为了生存，日本不得已进行了两场战争：首先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而此时此刻，我们还在与作为欧洲军事强国之一的俄国殊死一搏”。^②冈仓天心利用身居美国的便利，直接面向美国民众为日本辩护，试图推卸日本的战争责任，以博取同情甚至支持，其意图不言自明。

《茶之书》晚于《日本的觉醒》出版，日俄战争已于前一年（1905年）9月结束，^③但战争在西方造成的余波未平，《茶之书》的撰写与出版正是植根于这一国际形势，日本学者齐藤隆三对此有深刻认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欧美世界对日本刮目相看，但日本同时却也面临着被西方世界视为只拥有刀剑的好战之国的危险，冈仓天心于波士顿期间察形观势，遂动笔写作《茶之书》。”^④日本人既已在战场上用枪炮取得了胜利，冈仓天心就不再赤裸裸地加以辩护，而是着力塑造日本的文明形象，力图扭转美国人乃至其他西方人的

① Okakura Kakuzo, *The Awakening of Japan*,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4, pp.201–202.

② 闫晓艳：《冈仓天心的美国文化之旅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42页。

③ 冈仓天心撰写《茶之书》的时间大致在1905年至1906年之间，出版时间为1906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8日，于1905年9月最终签订和约。

④ 蔡春华：《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冈仓天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8页。

看法,“西方总是用某些事例,加上各种幻想,在亚洲人身上,织起一层层怪奇之网。其内容时常令人悚然以惊,要么不是把我们想成以莲花的香气为生,要么就是相信我们以蟑螂老鼠为食。我们的形象不是狂热迷信,而不愿觉醒;就是沉溺于最低下的感官享受,而不图振作”。^① 因为茶叶是世界各地广泛饮用(至少是颇为熟悉)的饮品,所以在冈仓天心看来,以此为题自然是上佳选择,他希望借茶叶揭示日本的民族文化精神,向西方展示自己塑造的日本的文明形象。因此,在当时的局势下,冈仓天心对《茶之书》中的一些内容是否准确或者合理无暇细究,甚至可能本就无意仔细考辨,毕竟这方面的疏漏不会对其根本意图造成影响。

可以看出,冈仓天心作为思想家与美术家,对茶叶及相关方面并无长期的专门研究。从艺术角度探析茶道,特别是其美学意涵,冈仓天心尚可发挥其长,但论及茶叶的历史,他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茶之书》成书于日俄战争战火方消的特殊背景下,冈仓天心急于借茶叶塑造日本的文明形象,故书中出现若干疏漏实属难免。

五、余论

《茶之书》自问世以来影响颇大,但其中涉及茶叶西传欧洲的内容存在明显的史实错误与资料使用不当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茶之书》关于茶叶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判断,不仅暴露了冈仓天心对英国茶税的认识偏差,而且导致其夸大了茶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此外,对茶叶在欧洲传播过程中遭遇的阻碍,冈仓天心的分析亦流于表面。类似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实则既源于冈仓天心作为思想家与美术家的知识结构限制,也与《茶之书》的写作意图有关。基于日俄战争的历史背景,冈仓天心希望借世界各地广泛了解甚至接受的茶叶塑造日本的文明形象,而书中某些内容是否准确在当时并不影响其写作意图的贯彻。

尽管如此,《茶之书》在美国出版之后仍然受到广泛关注,这一则与该书的特色有关,再者离不开当时的特定背景。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冈仓天心的英语写作水平很高,《茶之书》的行文清晰晓畅,契合美国民众的兴趣。关于《茶之书》的成书过程,主要有两种说

① [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法：其一，冈仓天心在波士顿美术馆任职后，经常举办一些面向社会大众的日本文化讲座，其中很多内容都与茶道相关，广受欢迎，这些讲座的讲稿便是《茶之书》的初稿；其二，冈仓天心受到有“波士顿女王”之称的贵妇加德纳夫人（Mrs. Gardner）青睐，为之讲述与演示茶道，后将其讲稿整理为《茶之书》。^① 无论按照哪种说法，都说明《茶之书》由针对非专业人士的讲稿整理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书具有语言优美、内容通俗易懂的特点，容易为大众接受，中国台湾作家蔡珠儿甚至认为，“《茶之书》的英文原作有如散文诗，清简隽雅，流丽可诵”。^② 此外，《茶之书》以茶叶这一日常消费品为主题，更容易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和共鸣，恰如冈仓天心所言，“东西方彼此差异的人心，却是在茶碗中，才真正地相知相遇”。^③ 就美国民众而言，尽管他们在独立战争期间对茶叶大加批判，但是其根深蒂固的饮茶习俗并未动摇。助产士玛莎·巴拉德（Martha Ballard）女士在1785—1812年的日记中共计700余次讲到饮茶、各类茶叶与茶具。^④ 美国独立后第一艘前来中国的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共投资白银71767两购买商品，其中仅茶叶一项（红茶与绿茶）就高达66100两。^⑤ 此后，美国商船购买茶叶的数量不断增长。茶叶贸易额增长的背后是茶叶消费的稳步发展，美国始终是全球重要的茶叶消费国之一，冈仓天心撰写的《茶之书》契合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兴趣。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茶之书》在美国的流行离不开特殊的历史背景。如前文所述，《茶之书》的写作与日俄战争密不可分，该历史时期美国对日本给以偏袒，日本方面也非常注意争取美国政府与民众的同情。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委派西奥多·罗斯福昔日在哈佛大学的同窗金子坚太郎出使美国，

① 参见沈冬梅：《冈仓天心〈茶之书〉与时代之研究》，《农业考古》2019年第2期，第227页；刘晓萍：《茶文化东学西渐之〈茶之书〉》，《农业考古》2019年第5期，第246页。

② [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序一”，第18页。

③ [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④ 参见Martha Ballard's Diary Online, <https://dohistory.org/diary/>, 2024年11月6日。

⑤ “中国皇后号”购买的商品为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南京布24担、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以及一定数量的船纱。参见[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他发现民众对日本颇为同情，于是因势利导，在纽约大学俱乐部、哈佛大学以及各种宴会与会议发表上百次演讲，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内容还印刷分发给了美国各地的政治家、社团组织、哈佛校友会等，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最终完成了使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 90% 的美国人对日友好的使命。^①冈仓天心虽不具有官方身份，但其思路实际上与金子坚太郎高度一致。《茶之书》不仅迎合了美国社会对日本的文化好奇与政治同情，还将此倾向进一步强化，从而与美国的社会舆论形成共振。这极大促进了该书在美国的传播。

近年来，《茶之书》在我国广受欢迎，诚如茶文化学者沈冬梅所言：“《茶之书》在中文世界的风行，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茶文化渐次从中国台湾而大陆复兴发展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②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消费升级与文化需求增加相互交织。茶叶作为雅俗共赏的特殊消费品，愈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茶文化热不断升温。《茶之书》以其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特点，备受读者推崇。不过，《茶之书》的作者冈仓天心毕竟不是专业研究者，而且该书撰写于 100 多年前，又有其特定的写作背景，故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甚至谬误之处，在翻译出版时理应详加考证与评析。事实上，本文涉及的《茶之书》中的一些疏漏，在今天出版的不少茶文化书籍中仍时有出现，这更凸显了相关考释的必要性。进而言之，《茶之书》中的疏漏对深化茶史研究不无警示意义：研究相关问题须注意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如此取径才能得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认识。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参见石萌：《金子坚太郎日俄战争期间旅美外交活动》，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第 27~35 页。

② 沈冬梅：《冈仓天心〈茶之书〉与时代之研究》，《农业考古》2019 年第 2 期，第 229 页。